

经济学名著译丛

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 逻辑方法



[英] 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 著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 逻辑方法

[英] 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 著

文璐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英)凯尔恩斯著;
刘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济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2104-0

I. ①政… II. ①凯…②刘… III. ①政治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6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济学名著译丛

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

[英]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 著

刘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104-0

2016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 28.00 元

译者序

苍穹只可管窥一豹，蝼蛄却能细致入微。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物质世界分解成基本元素，而对于浩瀚的宇宙，似乎未知永远多于已知。当把这一观点应用到一门科学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的难度远小于研究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位研究者，倘若想在宏观层面很好地把握他的研究，那这位研究者也必定是一个学富五车之人，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尚存争议”的学科而言尤其如此。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的力作《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1823—1875)，英国经济学家，常被后人称为“最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凯尔恩斯1848年和1854年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学习法律，早年从事过律师和报社工作。1856年被惠特利基金会委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85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第一版)就是他第一年授课的讲稿。1861年凯尔恩斯获得高威女王学院(Galway Queen College)的邀请，成为该校的法律与政治经济学教授。1866年凯尔恩斯进入伦敦大学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也是最早容许女生进入大学课堂的教授之一。1872年凯尔恩斯以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荣休

教授身份退休。

我们翻译的是经过作者补充和完善了一些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的第二版。整体来看,凯尔恩斯的这部书是自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以来对形成英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具有最重大贡献的著作。毫无疑问,他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几乎可以与大卫·李嘉图和穆勒的工作相提并论。

第一,凯尔恩斯重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它关于社会事实或社会系统的结论是完全中立的。“它既与自由放任无关也不涉及共产主义;既与契约自由无关也不涉及强权政治或地位尊卑。它独立于其他特殊的体系之外,而且,还在这些体系中显得完全中立。”政治经济学仅仅是追踪财富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并没有向实践提供规则。而且,凯尔恩斯既完全反对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反对把经济学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第二,凯尔恩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同时来源于“物质规律”和“精神规律”。“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对物质世界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规律的依赖是均等的——当前一个规律的性质发生变化时会同等地影响后一个规律。”“政治经济学既不属于物质门类,也不属于精神门类,而是处于中间位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界限是“在探究财富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时……他(经济学家)会发现他接触的一些物质或精神事实、政治或社会制度的现象并不属于经济范畴,一旦到这种程度,他就已经达到其研究目

的了,而这些原因应该被看作是与经济学相关的终极原因。并不是说这些原因不具有进一步分析和解释的价值,而是这些分析和解释已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

第三,凯尔恩斯认为,物质科学发展到当时阶段,纯粹的归纳法并不适用于政治经济学,演绎法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物质科学中的先例教会经济学家的是要把演绎法视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只要条件允许,把通过观察和经验而得来的事实作为验证由此获得的结论的方法,同时找到事实与其理论推理间的差异之所在,进而确定导致这些差异的干扰因素的本质。”而且,通过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调查研究方法联系演绎推理可以发现“影响经济现象的微小因素”,研究次要因素对经济规律的影响及作用。作者以“生产成本决定可自由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一经济学规律为例解释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调查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研究的适用性。也论证了经济规律应该是一种假设的真理,而不是确定的真理:它代表的不是实际发生的,而是趋向于发生的,或者是不存在某些干扰因素的情形下将要发生的。

第四,凯尔恩斯认为,虽然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但它毕竟以人性原理作为前提假设,所以,政治经济学无法像物质科学中的规律那样,达到用精确的数值表达式表述出规律的那种完美程度。而且,“即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是完全正确的,其解决方案也可能是不完美的”。

第五,凯尔恩斯认为,当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较为基础性的概念已经构建起来,并能够比较精确地运用,但“所有的定义只能被看作是暂时性的”,该学科还远没有定论。在政治经济学中,

好定义的标准应该是它能够准确地表述财富现象中事件和对象的特性。好的定义应该反映出事物本身最重要的差异；好的命名应该兼具重要性和技术性的统一。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已经通过日常语言发展起来，要在正确分类容许的前提下，使经济学术语的定义与日常用语尽量贴近，同时应该保证经济术语的清晰度和明晰性。

以上就是凯尔恩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引人深思的观点，我们尝试着总结于此，希望能在各位读者阅读本书时有所帮助。

我们翻译《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这部书时，发现从头至尾作者都以近乎辩论式的语言在探讨一门学问，我们不得不为他的学识之广博、逻辑之严密而深深折服。这部书的另外一大特征是，凯尔恩斯不仅能够在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论辩之后而以哲学家式的思维提出他的观点，亦能信手拈来地拿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例子作为论据而鞭辟入里。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阐述，还是在长过正文的注释里对话其他学者，他的思辨性和逻辑性都会让人由衷佩服。读一本好书，能带给我们的益处，就犹如苏东坡画竹前的胸有成竹，和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倘能在合下书页的一刻，顿感如此，那么每一位读罢此书的人都应怀有惬意。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作者是有时代属性的。19世纪的欧洲文明在赋予作者以哲学思维、自然科学规律、工业化社会等一系列优势的同时，也不能让作者脱离时代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经济学依然处于初始阶段的时候。作者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当然令人信服，但他没能认识到数学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

以及新事物的出现及其社会化发展会对经济学产生的变革多少让人感到遗憾。不过,经典之于流行,就如流星之于稳定的恒星。所以,我们才依然能够阅读和学习这部一百多前的著作。这应该成为我们对于处在不同时代下的经典作家们心怀崇敬与感激的缘由。

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我们对一门学问甚或对自然都在产生新的认识,这也促进着我们自身的进步。今天,经济学的形态和内容已然不同于作者所处的时期,我们不断运用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工具来处理经济问题。然而,有一点似乎我们不应忽略,那就是“回归本源”。万事万物都有返璞归真的趋势,这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无论其如何发展变化,也必然要记住它得以存在的根本,以及它最初存在时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每一位读到这本著作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些许裨益,并形成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理解。

《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这部书翻译的过程异常艰苦,作者强大的逻辑能力和思辨能力直接体现为句子长度极长、用词非常生僻,而且书中引入大量法文、拉丁文典籍,这些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幸运的是,翻译这部书的主要时间恰逢在挪威科技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在特隆海姆那个静谧、安宁的北欧小镇,科研、教学工作相对压力较小,可以在挪威科技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书中绝大多数引文的原版书籍,得以细细品味大师们的经典名著,也别有一番韵味!此外,这部书的翻译得到了我的研究生韩浩的鼎力支持,韩浩同学不仅做了一些章节的初稿翻译工

作,还不辞辛苦多次帮助我校对译稿,我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同时,我的研究生王晓曦同学也参与其中一章初稿的翻译,在此一并致谢!我的大学同学黄翠林女士,旅居法国多年,对书中所有涉及法文的翻译进行了校对。商务印书馆的李彬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我也深表谢意!

译者

东北财经大学师道斋

2015年7月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版序言	3
第一讲 导论	5
第二讲 政治经济学的精神与物质假设以及由此推导出的 原理的逻辑特征	22
第三讲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	42
第四讲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续)	62
第五讲 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不完美性	74
第六讲 政治经济学中定义的地位和目的	88
第七讲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100
第八讲 租金理论	120
附录 A	144
附录 B	150
附录 C	155
注释	157

第二版序言

这本书收录了17年以前发表于都柏林的一些讲稿，在其新版本向大众发行之际，有必要做一些解释。关于之前提出的实质性观点，即关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方法及其发展的观点，这一版本与第一版完全一致，不过在形式和处理方法上有了较大变动。许多章节都做了重新修改，第一版中仅是略有涉及的案例在本版中加大了篇幅，这一版本还增添了一些全新的观点。其中关于“定义”一讲便是新增添的内容。我衷心希望本书的结构相对于前一版本而言能稍显出自己的价值，以不辜负它受到的喜爱。然而，没有人能比作者本人更清楚这一版距离其心中理想的预期还相差多远。

关于逻辑方法的问题，最近讨论甚多，而这是在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尚未被人们注意的——我指的是数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运用问题。当时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立场是，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的来源，这一学科并不承认数学的处理方法。此后，我的朋友杰文斯(Jevons)教授出版了一本见解独到的书——《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书中他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随后，几个本国和欧洲大陆的学者都遵循着他的观点继续进行研究。在尽自己所能考察了杰文斯教授的论点后，而且只要这个学科对在数学领域并不精

通的人来说还可行，我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在我看来，经济学理论不是借助数学工具就能够发现的。假如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我随手就可以找到反驳它的方法——之前不为人知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用数学方法得出的，但我并不清楚到目前为止是否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数学方法的有效性。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同时，我无意否认，采用几何图形或者数学公式等其他方法同样能表示经济理论——也许有些人会认为采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学问题有其优势。而我斗胆反驳的是杰文斯教授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经济学知识可以通过数学方法获得发展，数学能够被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正如数学已经被用于力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理论一样。除非心理情感能够被精确地量化表示，或者经济现象并不取决于人类情感，否则，对于这些结论，我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解释得通。杰文斯先生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部分都必须数学化，因为数学处理的是数量以及各种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想要支持杰文斯先生的这一结论还需要更多论据。

我保留了大部分讨论的原稿，但当时讨论的一些问题如今看来已失去了曾经有的实际价值，因为之前一些例子中的推测如今已成为普遍承认的事实。然而，与在第一版中首次作为经济方法的原理被提出相比，它们并不会逊色。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再一次对我的朋友内斯比特(Nesbitt)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善良的他一如既往地帮我校稿，这极大地减轻了我当前的工作。

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

伦敦东南区基布鲁克(Kidbrook)公园路

第一版序言

获得政治经济学的惠特利教授资格(Whately Professorship)的一个条件是,该教授每年必须至少发表一篇报告。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斗胆超越这一要求,因为我所选择的这一题目,最适合我开设的公开课,没法随意地被压缩到一篇报告中。

至于本书中所提到的观点,为了防止读者误解,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声明:它不是任何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与之相反,我的目标是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带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那个在如今的许多著作中已被人们完全忽视,而曾经却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基本判断准则的标准的年代。着眼于此,我竭尽所能地去探究并清晰地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这一学科已由不少学者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Ricardo)、穆勒(Mill),他们的研究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到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推理中的逻辑方法。然而,我仍希望进一步探寻以巩固这些结论。为了得出这些结论,我运用了曾经成功引领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非凡成就的类似方法。

也许有人认为,如果我不去探究这些理论的逻辑原则,而是通过探索新的领域而研究这些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将对经济学的发

展更有裨益。对此我只能回应,流行于当今政治经济学学者中的观点存在许多根本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如此之突出,以致对我来说,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在面对这个学科中的困惑和矛盾时无别的路可走,只能重提那些决定理论的重要性和论据价值的基础性要点。倘若忽视这些矛盾的观点,继续探究原理(即便这些原理的根基常常被抨击),将会使该学科的研究近乎徒劳无益。

着眼于这一目标,在讨论经济学方法时,我必须首先阐述目前的观点中存在分歧的那些话题。在这一过程中我常常引用现在一些学者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为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反驳。我竭力避免整个论证的过程与最后的结论不符,但也许这个论证过程占据了全书太大的篇幅。

同样,我对全书注释的数量之多和篇幅之长感到歉意。正如我之前所述,这一学科的本质要求我常常引入当今具有争议的话题。在本书中,我每至一处原理都会停下来讨论,以便为大家介绍当前对该学科原理的一些反对意见,然而这可能会打破全书思想的连贯性,难免会削弱全书整体论证的力量。然而,如果不加关注而全部一笔带过,那么对于那些倾向于接受这些观点的读者来说恐怕效果会更不令人满意。因而我对自己的轻率深感愧疚,这样的轻率就好像一位入侵他国的指挥官在后方留下了大批未占领的堡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求助于仅有的其他途径——将这类讨论转移至注释中,如果论述的篇幅对于注释来说实在太长则直接转移至附录中。

第一讲 导论

第一节

在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正题之前，我也不能免俗地夸耀一番这一学科近期取得的成果，尤为令人满意的成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已经被广泛地写入国家的商业和金融法规，尽管有些还只是部分认可。这些新近成果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张也不过分，而且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理论近几年来获得了有益的修正和发展。不过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必须承认，这一学科整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并未达到政治经济学家一致满意的状态。

距离托伦斯上校 (Colonel Torrens) 写下下面这句话已经过去了 1/4 个世纪：“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科学中任何分支的耕耘者而言，争论期总是先于认同期而出现。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争辩的时期正成为过去，意见统一的时期正迅速来临。因此，从现在起二十年后对于该学科的基本原理人们将几乎不存在质疑。”¹ 如今，这一预言不幸已经发布了三十五年，然而在涉及人口、租金、对外贸易、各种不同类型支出的分配效应、价格理论等该学科基础内容方面的问题仍未解决，并必须仍要被看作是“开放性

问题”——倘若这一表达可以用来形容那些被激烈争论的话题的话。不仅仅是那些对政治经济学略知一二、一知半解者对此争论不休，这一学科的资深专家和公认的学者也同样参与其中。²到目前为止，争论期似乎并未过去，而是才刚刚开始——我的意思是，不仅那些居于次要地位的命题或者是经济理论的实际运用（因为这样的争辩仅仅是一个学科活力的象征，是学科发展过程的一个条必经之路）存在争议，而且构成政治经济学论证根基的那些基本原理也存在争议，后者就是托伦斯上校写下上面那些话时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

基本命题的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状态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顺利发展而言毫无疑问是不利的——在浮沙之上不可能建立起稳固恒久的大厦；此外，怀疑论重燃的危险也步步紧逼，这种对经济研究的怀疑态度曾一度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学的进步。诚然，希望政治经济学能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迅速而稳步地发展并不现实。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伦理学关系密切，这使得它时常陷于与道德情感和已有观念的碰撞中，而在基本原理的讨论过程中道德情感与已有观念本身却无法体现出来；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则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会对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行为产生直接的、显而易见的影响。再补充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专业术语都来源于日常语言，并且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受到口语散漫性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讨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对待数量、范围或者宇宙物质属性的观点一样，非得目标单一、表述严谨、论证严密——但成功的结论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可以解释经济学研究进程中出现的大部

分的反复无常和不稳定性,但我并不认为仅用这些便能解释目前该学科在基本原理方面的摇摆不定及令人不满意的现状。为了理解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那些具有重要特征的情形,特别关注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成功的那些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其商业发展更迅速、更广泛即是例证。

当政治经济学仅以其自身适当的、固有的论据而引起公众的注意时,那些未曾认真学习并掌握其基本原理的人便无法称自己为政治经济学家;同样,那些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未时常提及该学科公认原理的人也不能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家。但是,当自由贸易的巨大成功给予经济学家们所依赖的这些原理以公正的试验性证据之时,开展经济学讨论的模式以及参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们的层次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许多人现在把自己看作政治经济学家,却从来不曾努力学习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还有一些人,或许他们的能力不足而无法领会这一论据却仍然加入到队伍中。然而即便是那些已经掌握了基本原理的人,由于急于讨好大众读者,常常抛弃了这一学科的真正基础,而是试图在事实中以及自由贸易的结果中为该学科寻找更流行、更显著的论据。³这就好像数学家们为了拉拢新的支持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同意放弃分析方法,而将数学公式的正确性依赖于相应天文事件的年历一样。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以严谨、逻辑性强的风格见长,现在这种风格已经变为迎合不同听众的特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人们一直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更具有统计学的特征;然而现在变成了如下情景:结论比原理本身更具有吸引力;运算法则正代替归纳推理